

埃及文学界对民族自我认同的形塑与建构

(1881-1930)

文献综述

内容提要：埃及文学界知识分子在兴起于 19 世纪末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文学在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埃及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以及埃及近现代文学界与民族认同的联系的相关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埃及民族主义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及其产生的影响等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研究，阐释了埃及近现代文学界与埃及民族主义的密切联系，总体观点为：埃及近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埃及近现代文学复兴提供了动力，文学家创作的关于埃及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反过来又成为传播民族意识和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媒介。尽管如此，现有研究成果仍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未重视埃及文学界知识分子在埃及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前的思想奠基作用；其次，在研究埃及民族主义运动时，主要着墨于政治界、思想界的民族主义领导者，而事实上许多文学界人士也积极投身于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并且通过创办报刊、成立文学社团、举办沙龙等活动传播民族主义思想，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文学界知识分子的重要贡献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最后，现有研究成果虽已意识到文学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媒介，但是未深入探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期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体裁对民族认同的具体建构作用。

关键词：埃及近现代文学界，民族文学，埃及民族主义，民族认同，

埃及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文化，从法尤姆地区开始出现部落城邦算起，距今逾 7000 年。约公元前 3000 年，埃及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大一统国家，法老政权延续了 30 个王朝。^①自公元前 525 年起，埃及先后被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和统治。1798 年拿破仑占领埃及后，埃及日渐从奥斯曼帝国哈里发政权治下分离。1805 年穆罕默德·阿里尽管以奥斯曼帝国总督的身份上台，但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埃及王朝，阿里随后采取了一系列的世俗化改革。在脱离奥斯曼帝

^① “法老”是古埃及国王的尊称。现代学者采用埃及历史学家马涅陀的王朝框架将古代埃及进行分期如下：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5300-前 3100 年）；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3100-2686，即第一、第二王朝）；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2686-前 2181 年，即第三-第六王朝）……托勒密王朝（约公元前 305 年-前 30 年，即第三十二王朝）。自古王国时期起，国家政体、行政机构等逐渐出现并完善，国王始称“法老”。托勒密王朝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最后一任法老。至此，法老政权共历经 30 个王朝。

国和日益世俗化的背景下，埃及民众的政治忠诚逐渐转向了国家和土地，民族意识开始在埃及这个具有独特历史形态的地理和文化地区萌芽。19 世纪 70 年代，哲玛勒丁·阿富汗尼在埃及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觉醒，民族主义运动初露端倪。在赫迪威伊斯梅尔统治后期，埃及财政破产，1879 年，其子陶菲格在英国一手扶持下继任赫迪威一职。出于对亲英政府的不满，1879-1882 年奥拉比起义爆发，这是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奥拉比起义在英国的镇压下失败，1882 年埃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22 年虽实现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遭受英国的殖民压迫。直到 1952 年“七月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成立埃及共和国，埃及才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

现在的埃及既是独立的民族国家，也是阿拉伯世界、非洲、环地中海国家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基于其复杂的历史经历，加之地处亚非欧三大洲联结处，埃及文化的多元特性十分突出。因此，在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认同”概念从欧洲传入埃及后，埃及的民族认同开始在“东方或西方”“埃及或奥斯曼”“埃及或阿拉伯”等二元对立的选择中徘徊不定。民族国家认同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埃及亦不例外。埃及的民族国家认同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初的埃及领土民族主义^①运动，该时期也是阿拉伯文学叙事话语在埃及从萌芽到成熟的时期。这并非巧合，而是因为文学叙事话语的兴起与民族意识的增强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反之，文学叙事体裁又对埃及民族认同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对建构民族身份认同所具有的不可辩驳的作用，使埃及近现代文学界与埃及民族认同之间产生了天然的联系。在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之前，笔者首先对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如下。

一、埃及民族认同和埃及民族主义相关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埃及民族主义思潮及运动进行了研究，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研究埃及民族主义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产生影响，以及民族主义者的主张。王锁劳的博士论文^②系统研究了埃及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崛起（1907—1943）、逐渐转化为阿拉伯民族主义（1943—1971）以及回归（1971—1990）的发展过程，探讨了埃及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基本标志、显著特点以及发展的主导因素，他认为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对

^① “埃及领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由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于 20 世纪初提出，号召脱离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统治，追求埃及独立的民族国家地位，主张政教分离，亦可称为“埃及自由民族主义”、“埃及世俗民族主义”，“埃及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20 世纪 20 年代成为埃及民族主义的主流思想，30 年代后逐渐式微，被阿拉伯民族主义取代。萨莱迈·穆萨、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塔哈·侯赛因等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埃及领土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

^② 王锁劳：《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 年。

立以及埃及民族和埃及国家的分离是推动埃及民族主义发展的主导因素。赵克仁指出,埃及独特的历史文化孕育了埃及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且“随着现代埃及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阿拉伯民族主义让位于埃及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①王泰^②以一战为时间节点,梳理了埃及民族主义在战前、战中和战后的兴起和发展历程:19世纪70年代,在西方殖民入侵和阿富汗尼传播民族主义思潮^③的社会背景下,民族意识在埃及萌芽,民族主义运动初露端倪,此后,在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影响下,埃及民族主义曲折发展。一战削弱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实力,改变了埃及国内的阶级力量,促使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由战前的“改良”发展为战后的“革命”方式。孙笠^④分析了一战后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爆发的原因,即英国的殖民统治使埃及陷入政治困境,埃及社会各阶层深受压迫,反对殖民统治的呼声高涨。刘中民^⑤探索了埃及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的演变过程,他指出: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早期埃及民族主义思想仍包含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印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反映了以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的西方自由民族主义与以穆斯塔法·卡米尔的具有泛伊斯兰色彩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竞争,20世纪上半叶,埃及涌现了以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萨莱迈·穆萨和塔哈·侯赛因为代表的彻底的世俗化民族主义,他们崇尚法老主义、倡导全盘西化,排斥贬抑埃及的伊斯兰属性,主张政教分离。

袁指挥^⑥提出了埃及“法老民族主义”的概念:19世纪末随着埃及民族危机的加深,埃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迫切寻求救国之道,他们将民族主义诉求与埃及学相结合,形成了“法老民族主义”的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从地理环境角度论述埃及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埃及和埃及民族特质;从民族特性方面来说明埃及民族有别于阿拉伯民族;认为现代埃及人与古代埃及人本质上是同样的民族;将埃及民族与欧洲联系起来。图坦卡蒙陵寝的发现促使法老民族主义走向高潮,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扎格鲁勒陵寝争端是法老民族主义退潮的开始,知识分子从以法老主义为创作导向到以阿拉伯-伊斯兰为创作导向的转型促使法老民族主义进一步衰落,20世纪40年代,法老民族主义被阿拉伯民族主义彻底取代。闫忠林^⑦在其博士论文有关章节中阐述了埃及民族认同的演变,即由埃及民族主义逐渐转变为超埃及民族认同理念。埃及地方民族主义由20世纪初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奠定思想基础、20世纪20年代发展

^① 赵克仁:《埃及民族主义探析》,载于《阿拉伯世界》,2000年第1期,第29页。

^② 王泰:《一战与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转折趋势》,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2期。

^③ 笔者注:此处指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④ 孙笠:《一战后埃及民族主义运动之背景探析》,载于《现代交际》,2017年第6期。

^⑤ 刘中民:《埃及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与伊斯兰教》,载于《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

^⑥ 袁指挥:《论法老民族主义与埃及学》,载于《中东研究》,2022年第1期。

^⑦ 闫忠林:《近代以来阿拉伯民族的觉醒与“王政时期”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研究(1798-1958)》,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到顶峰，埃及地方民族主义者坚持埃及民族的历史根基是由法老文明奠定的，甚至有人主张埃及文化是地中海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埃及的未来在西方。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超越埃及的认同理念相继出现，主要表现为萨拉菲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他们抵制排外的法老理念，反对西方，否认埃及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王妍慧^①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埃及民族主义作为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实践中国家认同的案例进行研究，分析了埃及民族主义的兴起背景、内涵及其影响。她认为，埃及民族主义是在埃及社会阶层分化、内部民族矛盾激化以及英法殖民压迫和赫迪威伊斯梅尔的反动统治的综合因素下发展起来的，埃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奥斯曼主义思想以及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为埃及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此外，塔哈塔维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相统一的教育思想孕育了埃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陈静^②在其博士论文有关章节中分析了埃及国家认同的两种不同的观点：以穆斯塔法·卡米尔为代表的埃及民族主义仍坚持对奥埃曼帝国的忠诚；以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为代表的埃及民族主义则表现出了更加明显的国家认同，倡导脱离阿拉伯共同体和伊斯兰共同体，独立寻找国家的身份和认同，这一观点得到了塔哈·侯赛因、萨莱迈·穆萨和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的追随。

王恋恋^③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为视角，分析了自由主义时代埃及在由大地主和资产阶级为主的政治精英的带领下反抗殖民统治、实现主权独立，限制封建制度、发展立宪政治的进程，以及埃及民众在民族主义意识的激励下成立各种政治组织和社团协会促进埃及政治多元发展的过程。作者认为，民族主义思想在埃及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实现主权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谢立忱和田志馥^④研究了埃及三任总统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在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变化。其文指出，纳赛尔在泛阿拉伯主义的指导下，奉行联苏阿、抗美以、反英法的外交政策。萨达特在埃及民族利益至上原则的指导下，奉行疏苏亲美、近以远阿、改善和发展与西欧国家的外交政策，穆巴拉克则寻求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之间的平衡，在阿以关系以及与大国的关系上采取平衡外交的策略。在三位总统不同的对外政策的影响下，埃及形成了三种迥异的对外关系格局。

第二类是对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王妍慧^⑤认为奥拉比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埃及人民遭受内外双重压迫，间接原因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民族运动的发展，深层次原因则是埃及社会阶层分化及内部民族矛盾的

^① 王妍慧：《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研究（1798-1918）》，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② 陈静：《阿拉伯民族认同的历史演变》，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③ 王恋恋：《现代民族国家视角下埃及自由主义时代的政治建构》，载于《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

^④ 谢立忱、田志馥：《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埃及对外关系》，载于《世界民族》2009年第5期。

^⑤ 王妍慧：《埃及奥拉比运动原因探析》，载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5期。

激化。她认为奥拉比运动既是埃及历史上的一次民族独立运动，又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形成的一次重要实践活动。陈万里认为“1919年革命是1881年阿拉比革命的继续，继续高举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这面旗帜，为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殖斗争做出了榜样。”^①陈紫华全面分析了1919年革命的原因，认为它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埃及长期进行殖民统治和压迫、殖民剥削和掠夺以及文化思想的奴役和控制的必然结果；是埃及人民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民族矛盾和斗争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十月革命影响在埃及的必然反响”。^②蔡德贵和赵士珍^③研究了埃及1919年革命以前发生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包括奥拉比起义运动；穆斯塔法·卡米尔创立新祖国党和《旗帜报》，反抗英国的殖民压迫。但是，该文将这些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统称为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忽视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李芳洲^④以米斯尔银行的建立、发展和衰落为线索，阐述了米斯尔银行构建经济民族主义的实践。作者认为米斯尔银行的建立是近代以来埃及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埃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不断发展的产物，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为米斯尔银行的建立和早期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其创始人塔拉特·哈伯具有浓重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经济民族主义是埃及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塔拉特的推动下，米斯尔银行为20世纪上半叶埃及实现经济独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国内学者在编纂阿拉伯通史、埃及通史或埃及近现代史时，通常会对埃及近现代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进行专门叙述，比如，郭应德的《阿拉伯史纲》^⑤，哈全安的《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⑥，纳忠的《埃及近现代简史》^⑦，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之埃及卷》^⑧，杨灏城的《埃及近代史》^⑨等。

（二）国外研究现状

阿拉伯学界和西方学界也对埃及民族认同和埃及民族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研究，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视角与国内有相似之处，但更为全面和细致。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关于埃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发展。艾米

^① 陈万里：《埃及1919年革命与扎格鲁勒》，载于《阿拉伯世界》，1985年第1期，第70页。

^② 陈紫华：《浅析1919年埃及民族起义的原因》，载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第54页。

^③ 蔡德贵，赵士珍：《1919年以前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载于《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④ 李芳洲：《米斯尔银行与埃及经济民族主义的构建(1920~1939年)》，载于《西亚非洲》，2021年第4期。

^⑤ 郭应德：《阿拉伯史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⑥ 哈全安：《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⑦ 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三联书店，1963年。

^⑧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之埃及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⑨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娜·希贾吉 (أمنة حجازي)^①认为埃及爱国主义思想由塔哈塔维最先提出, 发展到 1914 年逐渐成熟。其间发生的奥拉比起义和英国占领埃及是两个激发事件, 而爱国主义思想的增强反过来又促进了埃及反抗英国占领的民族主义抵抗运动。赛德·纳赛尔丁·赛德 (السيد نصر الدين السيد)^②梳理了埃及民族的漫长历史, 他从“民族”的构成要素出发, 论证埃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民族, 指出埃及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延续至今, 这表现在两个维度: 一是埃及民族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 该自我意识在争取从外国统治之下独立出来的过程中得到复兴, 二是埃及人民具有持久的情感统一。拉玛吉·米哈伊勒 (رمزي ميخائيل)^③研究了自 1882 年英国占领埃及至 1922 年埃及实现独立的 40 年间, 报刊与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紧密联系, 他指出报刊在促进民族意识觉醒和支持民族独立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民族主义运动也影响了报刊的发展方向。拉玛吉·米哈伊勒·贾伊德 (رمزي ميخائيل جيد)^④研究了 1919 年革命中埃及科普特教徒和穆斯林团结一致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行动。贾伊德^⑤还研究了华夫脱党的成立及其为争取民族独立做出的努力, 在华夫脱党的感召下, 包括妇女在内的埃及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发动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 1919 年革命。胡拉·玛玛·瓦西巴 (Houra Mama Wahiba)^⑥梳理了从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泛伊斯兰主义主张, 到埃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至于爆发奥拉比起义, 再到以穆斯塔法·卡米尔为代表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争取埃及民族独立, 及至 1906 年丹沙威事件爆发导致克罗默下台, 埃及民族主义再次崛起的全过程, 她认为, 克罗默任埃及总领事时期采取的教育弱化和政治控制等政策引起了埃及知识分子的反抗, 导致了埃及民族意识的上升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亚瑟·小戈德史密斯 (Arthur Goldschmidt Jr.)^⑦揭示了从拿破仑入侵埃及至纳赛尔执政期间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及埃及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发展历程。该著第四、五、六章讲述了英国入侵埃及, 导致埃及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 最终, 在以华夫脱党为代表的埃及民族主义者及广大民众坚持不懈的抗争下, 英国于 1922 年同意埃及独立。其中第五章重点讲述了自 1892 年至一战前期埃及民族主义的兴起, 以及穆斯塔法·卡米尔发起的成立政党, 创建报刊, 要求结束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阿尔伯特·胡拉尼

^① أمينة حجازي، الوطنية المصرية في العصر الحديث: نشأتها ونموها حتى عام ١٩١٤،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٢٠٠٠.

^② السيد نصر الدين السيد، القومية المصرية قراءة في وضوح البدايات، ٢٠٠٩.

^③ رمزي ميخائيل، الصحافة المصرية والحركة الوطنية: ١٨٨٢-١٩٢٢،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١٩٩٦.

^④ رمزي ميخائيل جيد، الوحدة الوطنية في ثورة ١٩١٩،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١٩٨٠.

^⑤ رمزي ميخائيل، الوفد والوحدة الوطنية في ثورة ١٩١٩، دار العرب للبيئاني، القاهرة، ١٩٩٤.

^⑥ Houra Mama Wahiba, The Rise of Egypt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Self-Awareness under Cromer (1883-1907).

^⑦ Arthur Goldschmidt Jr., *Modern Egypt: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 Stat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4.

(Albert Hourani)^①研究了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东西方政治、军事、文化碰撞交流的背景下阿拉伯知识分子的不同思想主张。其著第七章研究了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的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第八章阐释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兴起的过程,以及穆斯塔法·卡米尔、萨阿德·扎格鲁勒等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巴萨姆·提比(Bassam Tibi)^②分析了埃及民族主义从以穆斯塔法·卡米尔为代表的激进派到以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和塔哈·侯赛因等为代表的温和派的演变过程,指出这两个派别的埃及民族主义者都反对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他进一步研究了胡斯尼倡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鲁特菲·赛义德和侯赛因倡导的埃及民族主义之间的分歧:胡斯尼认为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同属于阿拉伯民族,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谴责以鲁特菲·赛义德和侯赛因为代表的认为埃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埃及属性、并积极寻求埃及与欧洲联系的埃及民族主义。纳比拉·拉姆达尼(Nabila Ramdani)^③将埃及民族主义的现代起源追溯至奥拉比起义,展示了奥拉比起义的民族主义性质和伊斯兰特征,强调了伊斯兰教及乌拉玛在埃及民族主义的兴起中起到的促进作用,指出英国的殖民压迫政策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刺激了埃及1919年革命的爆发。乔尔·贝宁(Joel Beinin)和扎卡里·洛克曼(Zachary Lockman)^④叙述了埃及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包括1899-1914年间劳工运动兴起、1919年革命过程中和随后漫长的动乱和民族主义斗争期间工人阶级的行动和组织成为支持埃及国家民族事业的重要力量。此外,国外学者编撰的埃及近现代史或埃及通史中也对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运动有所记载,比如《埃及近现代简史》^⑤、《阿拉伯通史(下)》^⑥、《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⑦、《埃及史》^⑧等。

第二类是对埃及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的研究。伊斯雷尔·葛森(Israel Gershoni)和詹姆斯·扬科夫斯基(James P. Jankowski)^⑨分析了1900-1930年间埃及存在的三种民族主义倾向,即奥斯曼-伊斯兰倾向、埃及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其文指出1919年革命后至1930年间埃及领土

^① Albert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 Bassam Tibi,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arion Farouk Sluglett and Peter Sluglett, *Arab Nationalism: A Critical Enquiry*,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

^③ Nabila Ramdani, *The Rise of the Egypt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The Case of the 1919 Revolution*,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16.

^④ Joel Beinin and Zachary Lockman, *Workers on the Nile: Nationalism, Communism, Islam and the Egyptian Working Class, 1882-1954*,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1988.

^⑤ 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⑥ 费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

^⑦ 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郭子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⑧ 阿菲芙·鲁特菲·赛义德·马索特:《埃及史》,邹冬心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

^⑨ 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P. Jankowski, *Egypt, Islam, and the Arabs: The Search for Egyptian Nationhood, 1900-1930*,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民族主义占据上风，在此期间埃及知识分子通过宣传法老主义、创造埃及民族文学等途径来传播埃及领土民族主义。几年后二人合作的另一部著作^①指出，自1930年以降，由于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困难、倾向于阿拉伯穆斯林邻国的新埃芬迪阶层的出现以及埃及和阿拉伯国家联系的增强，导致新的超埃及民族主义逐渐取代排他性的埃及领土民族主义。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新的超埃及民族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表现，包括埃及东方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完整的埃及民族主义和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埃及政治中蕴含的超埃及民族主义表现。此外，伊斯雷尔和詹姆斯^②考察了20世纪几个重要的埃及国家纪念遗址，揭示了公共纪念在塑造和重塑现代埃及民族认同方面所起的作用。二人的著作论述了不同的公共纪念体系，第一部分考察了现代埃及著名的雕塑家马哈茂德·穆赫塔尔塑造的纪念碑在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公共空间和国家想象力中占据的中心地位；第二部分考察了与埃及民族主义政党国家党的前两位领导人穆斯塔法·卡米尔和穆罕默德·法里德有关的纪念仪式和纪念活动，追溯了每一项纪念活动所涉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图；第三部分考察了官方纪念活动，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庆祝埃及官方节日的仪式和修辞。作者指出，这些纪念形式的目的是保存和制度化所有埃及人共有的集体记忆，是埃及官方和民众为努力打造民族身份而做出的努力。

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③探索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法老历史通过文学、艺术、教育制度和政治活动在现代埃及国家建设中的表现，他从伊斯兰教对法老主义的敌视、西方对埃及考古学和法老文明的垄断、法老文明与现代埃及文明的断层三个方面，分析了法老主义在建构现代埃及民族国家认同过程中失败的原因，认为法老的历史和形象对埃及现代民族主义工程并不具有重要性。米里特·布特罗斯·加利（Mirrit Boutros Ghali）认为埃及悠久和多样性的历史使埃及的民族认同充满分歧，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全面的观点，造成埃及民族认同中充满矛盾的二元性：埃及和阿拉伯、东方和西方。他指出，“阿拉伯主义并不是埃及民族精神的全部内容，阿拉伯文化也没有吞没埃及文化。阿拉伯的贡献是埃及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埃及的民族精神中，阿拉伯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不是一个普遍的元素”^④，“我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埃及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地位，接受埃及人属于地中海文明这一事实，埃及是地

^① 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P. Jankowski, *Redefining the Egyptian Nation, 193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Jankowski, *Commemorating the Nation: Collective Memory, Public Commemo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gypt*, Chicago: Middle East Documentation Center, 2004.

^③ Michael Wood, The Use of the Pharaonic Past in Modern Egyptian National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1998, Vol. 35, 1998: 179-196.

^④ Mirrit Boutros Ghali, The Egypt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1978, Vol.32, No.1, 1978: 59-77, p.70.

中海文明的先驱。”^①唐纳德·马尔科姆·瑞德(Donald Malcolm Reid)^②考察了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埃及人(大部分是民族主义者)和欧洲人(大部分是帝国主义者)对埃及漫长历史的利用,揭示了考古学和博物馆对埃及民族认同建设的影响,指出埃及考古学的发展和四大博物馆(埃及博物馆、希腊-罗马博物馆、科普特博物馆和阿拉伯艺术博物馆)的依次建立使埃及民族主义者深刻体会到埃及的辉煌历史,激发了他们对法老祖先的骄傲之情。此外,唐纳德^③考察了1922-1952年间埃及古生物学家将埃及学研究从英国的控制下逐渐转为国有化的历程,随着埃及学的发展,古埃及法老遗迹出现在埃及人民面前,20世纪20年代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法老主义情怀占据上风,而20世纪30、40年代法老主义逐渐被阿拉伯-伊斯兰认同取代,纳赛尔执政后更是全面转向阿拉伯主义,萨达特则促进了当地对埃及古代史文明的自豪感和伊斯兰复兴。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埃及学和法老学说大肆宣扬的对古埃及的认同,已经成为现代埃及认同的一个独立的、自我维持的因素。

第三类是研究英国殖民统治与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杰恩·吉福德(Jayne Gifford)^④探讨了一战后英国在华夫脱党领导的埃及民族主义抗争下对埃及的帝国主义政策的转变。基思·威尔逊(Keith M. Wilson)^⑤梳理了1882-1982年一个世纪间英埃关系的演变历程,指出在英国殖民压迫下,埃及兴起了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罗伯特·蒂格诺(Robert L. Tignor)^⑥研究了自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至1914年间,英国殖民统治对埃及现代化的影响,其著第八章讲述了1895-1907年克罗默担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期间,埃及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既是对英国剥削的不满的反应,也是埃及现代化带来的更紧密的融合所导致的自然发展,此外,欧洲民族国家的形象使埃及民族主义者意识到只有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才能享有平等的权力,因而积极争取民族独立。艾法福·鲁特菲·赛义德·马尔萨特(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⑦阐释了克罗默担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期间的英埃关系,他在著作最后两章将焦点放在埃及民族

^① Mirrit Boutros Ghali, The Egypt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1978, Vol.32, No.1, 1978: 59-77, p.73.

^② Donald Malcolm Reid, *Whose Pharaohs? Archaeology, Museums, and Egyptian National Identity from Napoleon to World War I*,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③ Donald Malcolm Reid, *Nationalizing the Pharaonic Past: Egyptology, Imperialism, and Egyptian Nationalism, 1922-1952*, James Jankowski and Israel Gershoni (ed.), *Rethinking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27-149.

^④ Jayne Gifford, *Britain in Egypt: Egyptian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 Strategy, 1919-1931*, London and New York, 2020.

^⑤ Keith M. Wilson,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The Anglo-Egyptian Experience, 1882-1982*, Bronx: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83.

^⑥ Robert L. Tignor,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 1882-191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⑦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 *Egypt And Cromer: A Study in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New York & Washington: Frederick A. Praeger, 1969.

主义运动，指出埃及第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奥拉比起义）是为了反对赫迪威陶菲格的统治，第二次民族主义运动是在赫迪威阿巴斯的支持下针对英国的占领。他认为，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并非由一个领袖领导的单一运动，而是由几个背景、倾向不同的人形成的不同支流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的。戴利^①研究了英国占领埃及期间（1882-1922 年）埃及民族主义的重生和寻求民族独立的运动，他指出，自 1892 年赫迪威陶菲格去世，其子阿巴斯·希米尔二世继任后，鼓励埃及民族主义运动，以穆斯塔法·卡米尔和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为代表的埃及民族主义者成立政党、创建党报，积极寻求民族独立，埃及最终在以萨阿德·扎格鲁勒为代表的华夫脱党的带领下脱离英国占领，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

第四类是对埃及女权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关系的研究。玛格特·巴德兰（Margot Badran）^②探讨了 1870 年代至 1925 年间埃及女性为反抗父权制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而发起的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她将女性的民族主义意识和行动分为两个阶段，1870 年代至 1919 之前处于隐身和谨慎突破的阶段；1919 年革命女性参与示威游行首次进入公共空间，自此直到 1923 年，是女性进一步进入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朦胧可见时期。玛格特认为，女性的女权意识的觉醒及女权行动早于她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民族主义行动，并且，埃及女性的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产生了积极的相互作用，女性的女权主义意识的觉醒使其建构了不同于男性民族主义的女性民族主义运动，而后者又客观上促进了女性解放。玛格特另一部著作^③研究了胡黛·沙拉维（1879-1947）发起的女权运动，并对女权主义民族主义者的活动进行了考察，她利用妇女的记录和文件，追溯了土著女权主义的出现，并认为这些妇女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者。贝丝·巴伦（Beth Baron）^④探讨了埃及民族的性别形象与女性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活动之间的联系。她在著作第一部分展示了埃及民族的女性形象，即埃及在绘画、纪念碑、漫画以及邮票中被赋予女性象征；在第二部分研究了 1919 年以来女性政治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成分，进而指出，由于女性民族主义者未专注于书写历史，历史记载倾向于将她们的活动边缘化，精英女性更多地作为记忆的场所或民族主义的象征而非政治角色而为人所知。托马斯·菲利浦（Thomas Philipp）^⑤探讨了兴起于 19 世纪末的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系。他指出，以穆斯塔法·卡米尔和塔尔特·哈布为代表的早期民族

^① M. W. Daly(ed.),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39-251.

^② Margot Badran, Dual liberation: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Egypt, 1870s-1925, *Feminist Issues*, 1988, Vol.8, No.1, 1988: 15-34.

^③ Margot Badran, *Feminists, Islam, and Nation: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Princeton &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④ Beth Baron, *Egypt as a Woman: Nationalism, Gender, and Politics*,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⑤ Thomas Philipp, Feminism and Nationalist Politics in Egypt, *Women in the Muslim World*.

主义者反对妇女解放运动，以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和卡西姆·艾敏为代表的倡导社会改革的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有限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号召妇女接受教育，但是他们认为妇女只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职能部分，而不是一个具有与男子同样天生权利和能力的人。他同时指出，自女权主义兴起至 1919 年革命期间，女权主义者自身也将焦点至于个人自由、地位和与丈夫、孩子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上，而并未争取政治权利。纳比拉·拉姆达尼^①指出，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埃及妇女运动随着妇女期刊的涌现而兴起，此外，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精英女性在 1919 年 3 月首次参加了民族主义示威，并在 1922 年成为埃及名义上获得独立的关键力量。由此他得出结论，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积极互动，妇女运动对变革的激进呼吁加强了民族主义事业，反之，女权主义者借助与民族主义者的密切联系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利基础，二者结合形成一股强大的运动力量，对埃及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埃及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深入探索了埃及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原因，重点研究了奥拉比运动和 1919 年革命这两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分析了埃及民族主义者的诸多思想主张。依然存在的问题是：首先，学者们对埃及民族意识觉醒的时间各执己见，有人认为是兴起于 19 世纪 70 年代阿富汗尼在埃及传播的民族主义思潮；^②有人认为早在穆罕默德·阿里派遣的留学生受到西方民族民主思潮影响后，这些精英的民族意识便开始觉醒；^③还有人认为是塔哈塔维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使埃及人树立起了民族意识，^④等等。第二，国内外学术界对埃及领土民族主义的起源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将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看作埃及领土民族主义的奠基者，^⑤也有学者认为在鲁特菲·赛义德之前开启政治生涯的穆斯塔法·卡米尔也是埃及领土爱国主义的热情倡导者。^⑥第三，现有研究主要将埃及民族主义的兴起归因于殖民统治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忽视了思想文化的先导因素，即埃及文学界知识分子率先通过对埃及古典文学的挖掘和再现，对西方民族民主思潮的引进和传播，为埃及民族意识觉醒奠定的思想文化基础。此外，在研究埃及民族主义运动时，主要着墨于政治界、思想界的民族主义领导者，如奥拉比、穆斯塔法·卡米尔、萨阿德·扎格鲁勒，而事实上许多文学界人士也积

^① Nabila Ramdani, Women in the 1919 Egyptian Revolution: from feminist awakening to nationalist political activ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2013, Vol.14, No. 2, 2013:39-52.

^② 王泰：《一战与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转折趋势》，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78 页。

^③ 王妍慧：《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研究（1798-1918）》，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113 页。
^④ أمانة حجازي، الوطنية المصرية في العصر الحديث: نشأتها ونموها حتى عام ١٩١٤،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٢٠٠٠.

^⑤ 闫忠林：《近代以来阿拉伯民族的觉醒与“王政时期”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研究（1798-1958）》，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120 页。

^⑥ 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P. Jankowski, *Egypt, Islam, and the Arabs: The Search for Egyptian Nationhood, 1900-1930*,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6.

极投身于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并且通过创办报刊、成立文学社团、举办沙龙等活动传播民族主义思想,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后者的重要贡献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因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二、关于埃及近现代文学界与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联系的研究

(一)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研究了埃及近现代文学复兴运动与埃及民族主义的关系,普遍认为埃及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埃及近现代文学复兴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爱国情怀和民族主义成为埃及复兴文学的重要创作主题之一。这类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为有关埃及近现代文学史、阿拉伯文学史的专著。例如:仲跻昆^①全面梳理了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的阿拉伯文学复兴和发展的历程,将阿拉伯文学分为尼罗河流域阿拉伯文学、沙姆地区阿拉伯文学、马格里布地区阿拉伯文学以及伊拉克、也门和海湾地区阿拉伯文学四个区域,分别讲述阿拉伯文学在不同地区的复兴进程,其中最先介绍的是埃及的现代阿拉伯文学。该著指出,1798年拿破仑率军入侵埃及拉开了埃及近现代史的序幕,也为埃及近现代文学的复兴运动吹响了前奏,埃及近现代文学是在埃及人民反抗殖民侵略、寻求民族独立的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又反过来推动和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蔡伟良和周顺贤^②探索了阿拉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在介绍埃及现代文学时,通过分析埃及现代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得出结论:“在发掘和继承阿拉伯文学遗产的同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学习借鉴西方成就,无疑会促进埃及文学以新的面貌迅速发展,成为阿拉伯各国文学中的先行者”。^③孔令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在东西方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背景下,阿拉伯文学和欧洲文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学对欧洲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发挥了关键作用,近代欧洲文学传入阿拉伯地区,又促进了近现代阿拉伯文学的复兴,埃及是阿拉伯文学复兴的中心。作者认为“埃及的文学复兴运动既有文学本身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近代埃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斗争的迫切需要……从其本质来看,它的复兴也是埃及国家和民族走向复兴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缺的部分”。^④黎跃进^⑤系统地研究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在东西方文化冲突、殖民与反殖民的背景下形成的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埃及

^① 仲跻昆:《阿拉伯现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

^② 蔡伟良、周顺贤:《阿拉伯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③ 蔡伟良、周顺贤:《阿拉伯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4-195页。

^④ 孔令涛:《文化大背景中的阿拉伯文学和欧洲文学影响研究》,载于《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

^⑤ 黎跃进:《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昆仑出版社,2014年。

作为西亚北非地区的重要国家是其重点研究对象之一。该书第四章介绍了 20 世纪初至 60 年代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具有反对殖民统治、要求民族独立和弘扬民族传统的主题思想等共同特征,同时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作家,比如印度的泰戈尔、埃及的陶菲格·哈基姆和马哈福兹等作家的创作又各具独特的个性;第八章以阿拉伯历史小说家乔治·泽丹的创作为例,指出以历史为主题的文学创作,是重建民族文化,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此外,上述文学史著作也对埃及新古典主义诗歌、小说和戏剧这些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体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情怀进行了分析,比如巴鲁迪的诗歌、艾哈迈德·绍基的诗歌和诗剧、陶菲格·哈基姆的小说和戏剧、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的小说等。

此外,国内学者对埃及近现代重要诗人、作家的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怀进行了研究。林丰民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亚层面的各地区民族主义都极力强调各自的文化内涵与文明成就,民族主义思潮在中东各国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埃及民族主义者为他们的法老文明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把埃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区别开来,而着重强调属于埃及人自身的文化,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许多思想家的著作里,而且也体现在许多文学家的作品中。诗人艾哈迈德·绍基和尼罗河诗人哈菲兹·易卜拉欣的长诗就常常侧重描述埃及历史的辉煌和埃及创造的古老文明。”^①丁钰梅^②分析了陶菲格·哈基姆的戏剧和小说作品中体现的厚重的爱国思想。黎跃进^③揭示了陶菲格·哈基姆的小说《灵魂归来》蕴含的埃及民族主义精神,他认为陶菲格在《灵魂归来》中否定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及殖民者带来的西方文化,并以埃及农业文明来对抗西方的殖民统治,呼吁埃及民族灵魂回归。张蕊^④探索了埃及世俗主义知识分子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认同转向。在埃及自由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影响下,以塔哈·侯赛因、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和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等为代表的埃及世俗主义知识分子于 20 世纪 20 年代积极进行去阿拉伯认同和去伊斯兰认同的埃及民族主义文化认同的建构,他们挖掘和宣传法老主义、寻求埃及与西方的联系;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面对埃及宪政失败、陷入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的现状,埃及世俗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全盘西化的道路,着手复兴埃及的阿拉伯伊斯兰属性,从埃及自由民族主义转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

(二) 国外研究现状

^① 林丰民:《论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载于《东方论坛》,2008 年第 3 期,第 34 页。

^② 丁钰梅:《埃及作家陶菲格文学叙事的思想维度》,载于《中国穆斯林》,2017 年第 4 期。

^③ 黎跃进:《东方原始主义与民族精神——论哈基姆的小说〈灵魂归来〉》,载于《当代外国文学》,1998 年第 3 期。

^④ 张蕊:《从西方到东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埃及世俗主义知识分子的认同转向》,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年。

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埃及近现代文学界与埃及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关系,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研究埃及近现代文学与埃及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布鲁格曼(J. Brugman)^①全面梳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埃及近现代文学复兴运动中不同文学体裁和各种文学流派的兴起和发展的历程及其代表人物和作品,以及埃及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作者指出,埃及现代文学通常被认为始于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兴起,新古典主义是一场与民族主义兴起和穆斯林现代主义相适应的文学运动;20世纪20年代“新派”(al-madrasah al-hadithah)作家积极倡导一种“民族文学”(al-Adab al-Qawmi),这是埃及民族主义者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关于埃及民族国家思想的文学成果,“民族文学”的主要体裁是小说,法老主义是其重要主题。及至30年代,当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占据上风后,“民族文学”遂失去了动力。伊斯雷尔·葛森(Israel Gershoni)和詹姆斯·扬科夫斯基(James P. Jankowski)^②将埃及“民族文学”作为埃及民族主义者塑造埃及形象的一种维度进行了研究,指出埃及“民族文学”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的形成受到埃及知识界两个特征的影响,一是埃及领土民族主义在1919年后成为埃及的主要民族主义取向,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创造一个新的埃及国家形象需要对埃及环境的欣赏和对埃及历史的重新解释,同样,也要求埃及文学活动的转变;二是大部分埃及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对阿拉伯文学持敌对态度,在他们看来,摆脱传统阿拉伯文学束缚的唯一途径是创造一种新的埃及文学,这种文学的所有主题都来自埃及独特的文化。作者进一步阐释了埃及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为创造新的民族文学而做的努力:发展出一种国家文学理论,能够定义民族文学的性质、功能和内容;引入新的民族文学体裁;思考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这种新的民族文学。

绍基·戴伊夫(شوقي ضيف)^③对1850-1950年的一百年间涌现出的作家、诗人和文学流派概括地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文学生活中各种起作用的因素和动力,揭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对诗歌和散文的形式及内容革新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分析了部分诗人和作家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们的作品中洋溢的民族主义精神,但是戴伊夫并未将文学家们的埃及民族主义倾向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进行严格区分。萨布里·哈菲兹(Sabry Hafez)^④探索了阿拉伯叙事话语兴起的文化背景和诞生的历程。他指出:阿拉伯叙事话语兴起于对阿拉伯民族和政治身份的强烈追求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中,既借鉴了

^① J. Brug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 in Egypt*, Leiden: E. J. Brill, 1984.

^② 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P. Jankowski, *Egypt, Islam, and the Arabs: The Search for Egyptian Nationhood, 1900-1930*,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③ شوقي ضيف، الأديب العربي المعاصر في مصر، دار المعارف، القاهرة، ١٩٦١.

^④ Sabry Hafez, *The Genesis of Arabic Narrative Discourse*, London: Saqi Books, 1993.

阿拉伯文学传统中固有的各种叙事符码，同时又吸收了在与欧洲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新的经验模式，是一种特殊历史进程和一种新的阅读群体兴起的结果。阿拉伯新叙事话语最早在埃及出现萌芽，标志是 1881 年埃及作家阿卜杜·纳迪姆对叙述话语的首次尝试，1929 年马哈茂德·塔希尔·拉辛创作的短篇小说《乡村闲谈》则标志着阿拉伯叙事话语的成熟。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محمد حسين هيكل）^①阐释了埃及现代文学与埃及民族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自奥拉比革命后，埃及的现代阿拉伯语文学一直深受革命因素的影响，奥拉比革命导致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也导致了文学革命转向文学和语言中的新与旧之争，且伴随着埃及民族主义革命的发展，埃及作家开始努力进行民族文学的创作。贝丝·巴伦（Beth Baron）^②揭示了诗歌、民谣、通告等形式的口头文学在埃及文盲或半文盲群众中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些口头文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英国占领时期诸如“丹沙威事件”的屈辱记忆在普通民众传播，从而激发埃及民众维护国家荣誉的民族主义情绪。萨玛·赛利姆（Samah Selim）^③指出，在 19 世纪后期，伊斯梅尔为建立大型私人农业庄园做出了贡献，进一步改变了国家与农村腹地的关系，英国殖民当局通过进一步的农业立法和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生产的精细管理巩固了这一进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农民”开始作为一个潜在的国家主题进入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话语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新的阿拉伯叙事体裁正在形成。在这两股历史力量交汇的时候，“农民”成为民族主义话语和小说的中心主题。因而 19 世纪末和整个 20 世纪的许多埃及小说都以乡村为背景，大多数埃及作家至少写过一部关于农民和村庄的小说。赛利姆通过研究七部 20 世纪的具有开创性的乡村小说，阐释了 20 世纪埃及政治、意识形态和小说之间的关系。

第二类是研究埃及近现代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认同转向。前文提及的阿尔伯特·胡拉尼的《自由时代的阿拉伯思想：1798-1939》一书，对埃及近现代文学家阿卜杜·纳迪姆的埃及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讨论。作者指出，纳迪姆是奥拉比起义的发言人，“从他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围绕‘民族’概念形成的情感的第一次充分表达，这种情感形成了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思想状态”。^④戴达维·萨夫兰（Dadav Safran）^⑤探讨了 1804-1952 年间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和意识形态演变：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在埃及与欧洲重新接触的影响

^① محمد حسين هيكل، ثورة الألب، مؤسسة هنداوي للتعليم والثقافة، القاهرة، ٢٠١٢.

^② Beth Bar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Honor in Egypt, *Gender & History*, 1993, Vol.5, No.2, 1993: 244-255.

^③ Samah Selim, *The Novel and the Rural Imaginary in Egypt 1880-1985*,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④ Albert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96.

^⑤ D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An Analysis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Evolution of Egypt 1804-195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下,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迅速地发生了变化,现实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这破坏了现有的政治共同体。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埃及社会先后出现了伊斯兰现代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两种意识形态,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自由民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塔哈·侯赛因、海卡尔、陶菲格·哈基姆、艾哈迈德·艾敏等人积极著书立说,努力为埃及自由民族主义和埃及采用的人民主权统治的具体制度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基础,宣扬西方的理性主义。20世纪30年代早期以后,由于埃及宪法制度运行的失败以及二战后的经济危机动摇了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埃及的自由民族主义式微,逐渐被阿拉伯-伊斯兰认同所取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开始寻求与阿拉伯-伊斯兰传统和历史的联系。

艾弗拉姆·巴拉克(Efraim Barak)^①和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D. Smith)^②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埃及文学界知识分子的认同转向,即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陶菲格·哈基姆等具有西方倾向的作家开始从以法老主义为导向的文学创作转向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文学创作,试图将伊斯兰文化描绘成一种与西方文化平等,甚至优于西方文化的选择,以抵抗西方的东方主义者对伊斯兰文化的批判。伊斯雷尔·葛森(Israel Gershoni)^③指出,以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塔哈·侯赛因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善于从埃及丰富而悠久的历史中选择传统遗产和文化,试图塑造一种新的民族身份,为埃及社会打造一种现代民族文化。在1919-1952年间,这些民族主义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经历了从1919-1933年间基于尼罗河谷独特历史遗产的埃及领土共同体,向1930年代早期至40年代后半期甚至更长时间内基于伊斯兰-阿拉伯历史遗产的超埃及的伊斯兰-阿拉伯共同体的转变。葛森在另一篇文章^④中描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现代埃及社会两大文化体系——埃及文化体系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在民族文化的塑造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中相互竞争的过程。19世纪末至一战时期,两个文化体系各有支持者,竞争并不激烈;1918-1933年间埃及文化体系占据主导地位,30年代早期以后至40年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埃及社会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葛森指出,埃及知识分子作为民族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媒介,始终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① Barak, Efraim, Egyptian Intellectuals in the Shadow of British Occup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08, Vol.35, No.2, 2008: 173-186.

^② Smith, Charles D., The 'Crisis of Orientation': The Shift of Egyptian Intellectuals to Islamic Subjects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73, Vol.4, No.4, 1973: 382-410.

^③ Israel Gershoni, Imagining and Reimagining the Past: The Use of History by Egyptian Nationalist Writers, 1919-1952, *History and Memory*, 1992, Vol.4, Vol.2, 1992: 5-37.

^④ Israel Gershoni,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Egypt: Intellectual Formation and Social Diffusion, 1892-1945, *Poetics Today*, 1992, Vol.13, No.2, 1992: 325-350.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研究涉及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穆娜·库里(Mounah A. Khouri)^①研究了活跃在1882-1922年间英国占领期间的主要诗人,将其作品作为研究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资料,并分析了部分诗歌中体现的诗人的爱国情怀和埃及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诗人对女权主义、教育改革、宗派冲突等社会问题的关注。霍达·埃尔赛达(Hoda Elsadda)^②指出,小说作为一种塑造民族身份和促进民族想象的文学体裁,已经成为争论的场所和思想斗争的战场。她考察了19世纪晚期到21世纪头十年期间,埃及生产的关于性别和民族主题的经典阿拉伯语小说,将性别表征与民族想象的话语建构的关系作为分析这些小说的重要维度,并且通过分析阿伊莎·泰穆尔、杏德·努法尔、马立克·希芙尼·纳西芙和莱比巴·哈希姆的作品强调了女性作家对民族文化想象的贡献。麦尔维特·海特姆(Mervat F. Hatem)^③通过研究埃及女作家阿伊莎·泰穆尔的生活和文学作品,揭示了她是如何以文学为媒介在埃及民族建构以及关于性别关系和权利的公共辩论中发挥作用的。阿伊莎借助小说叙事框架《言行改变的后果》(Nata' ij al-Ahwal fi al-Aqwal wa al-Af'al)阐明她关于“国家进程和历史”的观点,使读者能够同时观察到共同体正在经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并使其增强与共同体其他成员的联系;阿伊莎在1892年发表的社论文《一些事情的反射镜》(Mir' at al-Ta'mul fi al-Umur)和阿拉伯语诗集《独领风骚》(Hilyat al-Tiraz)中发起了关于性别角色和权利的公开讨论。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埃及近现代文学界与埃及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之间的密切联系,总体观点为:埃及近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埃及近现代文学复兴提供了动力,刺激了新的叙事体裁的诞生,同时为文学家提供了新的创作主题;文学家创作的关于埃及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反过来又成为传播民族意识、建构民族认同和塑造民族身份的重要媒介。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亦有不足之处。首先,国内现有的关于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情怀的研究成果往往将阿拉伯民族认同与埃及民族认同混为一谈,未体现文学对埃及民族国家认同建构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其次,20世纪20年代以小说体裁为主的埃及“民族文学”是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的领土民族主义思想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民族文学”运动对1919年革命后埃及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发挥了主导作用。虽然部分国外学者注意到了这一时期的埃及“民族文学”运动,但只是对其进行概括性地介绍,并未专门研究这一

^① Mounah A. Khouri, *Poetr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1882-1922)*, Leiden: E. J. Brill, 1971.

^② Hoda Elsadda, *Gender, Nation, and the Arabic Novel: Egypt, 1892-2008*,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③ Mervat F. Hatem, *Literature, Gender, and Nation-Build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Egypt/ The Life and Works of A'isha Taymu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时期的文学作品是如何塑造埃及民族认同的，而国内学者对埃及“民族文学”更是缺乏关注。鉴于此，本论文将系统和深入地研究小说等叙事话语和“民族文学”运动对埃及民族认同的建构作用。

三、关于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作用的理论论述

现代主义建构派民族理论强调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社会建构性，同时认为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一起创造了民族，代表人物主要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①“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下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简言之，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②盖尔纳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民族主义有时候会利用先存的文化，把它们变成民族，有时会创造民族，而且经常消灭先存的文化”，^③“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④民族主义在民族形成和民族与国家的统一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场悲剧”。^⑤安德森从认知层面诠释“民族”的概念，提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且，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⑥“想象的共同体”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是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他指出，自中世纪后期开始，拉丁语神圣地位的下降和印刷方言的崛起导致神圣的宗教共同体日趋衰落，17世纪以来神圣君主统治的正当性的衰退，以及“神谕式时间观念的没落”，这三个因素导致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使“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成为可能。安德森强调印刷资本主义对民族意识产生的促进作用：首先，印刷语言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播的媒介，哪些口操不同语言、难以彼此交流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互相理解了，被这些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其次，印刷资本主义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这种固定性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的民族理念”而言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

^①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页。

^②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9页。

^③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④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⑤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9页。

^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页。

第三，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利语言。^①

该理论强调文学对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作用。正如安德森所指出，兴起于 18 世纪欧洲的印象形式——小说和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②他认为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而小说和报纸的叙事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③进而使人们想象民族-国家这个特殊的共同体。中国学者王逢振也强调：“民族性与文学关系非常密切，不仅与小说的内容相关，而且与小说的形式相关。小说本身体现着民族的形成过程，因此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会不同。”^④霍布斯鲍姆则认为，“拥有悠久的精英文化传统，并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学与官方语言”是构成民族的三大要件之一。^⑤

此外，族群-象征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史密斯强调民族文化和文学对民族意识的激发作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需要经受民族的文化浸染——本民族历史的重新发现，通过语言学、词典学等学科复活本土语言，培养民族文学尤其戏剧和诗歌旨趣”。^⑥上述关于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作用的论述是“埃及近现代文学界与民族认同”这一选题的主要理论依据。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43-44 页。

^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3 页。

^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4 页。

^④ 王逢振：《民族-国家》，收录于金莉、李铁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年，357 页。

^⑤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第 34 页。

^⑥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 页。